

文史资料选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二十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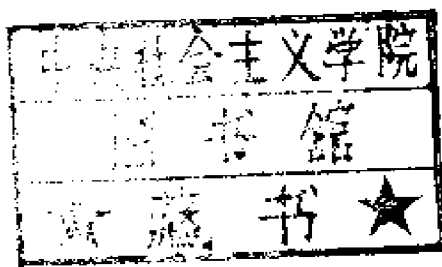
- 瞻仰父亲李大钊的墓碑……………李欣华
周恩来总理与冯玉祥将军的亲密交往……………葛效先
徐世昌……………邓之诚 遗稿
吴佩孚致冯玉祥书……………河南图书馆藏
由“四大徽班”时代开始到解放前的京
剧编演新戏概况……………景孤血遗稿
艺坛沧桑话今昔……………高凤山
北京集邮活动的兴起和发展……………杨启明 等
回忆东岳庙……………傅长青

北京出版社

K291.5:3 2003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二辑



20031412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916.05.10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二辑

Wenshiziliao Xuanbian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183,000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1—6,990

书号: 11071·212 定价: 1.10元

(内部发行)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二辑 目 录

瞻仰父亲李大钊的墓碑	李欣华 (1)
周恩来总理与冯玉祥将军的亲密交往	葛效先 (7)
朱德同志与中山公园兰花	李逢敏 (13)
徐世昌	邓之诚遗稿 (22)
我所知道的徐世昌	李宝忱 (29)
吴佩孚致冯玉祥书	河南图书馆藏徐长青录 (37)
附：关于《吴佩孚致冯玉祥书》我闻	徐长青 (40)
关于狄考文其人其事	山东省蓬莱县政协 (41)
读《吴佩孚致冯玉祥书》后	荣孟源 (42)
江朝宗二三事	靳 麟 (44)
附：街谈巷议	姚诗正 (47)
困河行宫今昔	李丙鑫 (48)
定慎郡王·毓朗·定王府	恒如馨 (59)
书杨翠喜案	邓之诚遗稿 (72)
附：《书杨翠喜案》后记	邓 珂 (73)
有关杨翠喜的传闻	马士良 (76)
附：贝子载振辞职疏	马士良 (77)

由“四大徽班”时代开始

到解放前的京剧编演新戏概况 ……………景孤血遗稿 (78)

艺坛沧桑话今昔……………高凤山 (108)

艺坛姐妹——忆李再雯 ……………魏喜奎 (142)

旧中国北平市户政 ……………茅复山 (153)

我国警政的由来……………恒如馨 (170)

解放前夕的北平市警察局 ……………李 芳 (172)

北平警备司令部设计委员会侧记……………万永光 (177)

北平市两所中央警官学校的由来……………许兆林 (183)

北京集邮活动的兴起和发展

……………杨启明 沙伯泉 韦景贤 王席儒 (188)

我国第一次航邮试航失败的经过……………唐友诗 (198)

回忆东岳庙 ……………傅长青 (201)

俄国东正教在中国的兴衰 ……………杜立福 罗荣禄 (222)

魔窟历险记

——我被中美合作所招考的受骗经过……………邱韵珊 (234)

东交民巷旧貌……………王述唐遗稿 (239)

西长安街琐忆……………陈家骥 (245)

读者来信

郑振铎没有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四次大会·····	陈福康	(252)
对陈福康同志来信的答复·····	萧超然	(253)
张自忠将军殉国地点在哪里·····	李致远	(255)
韩世昌未压迫韩世昌改名·····	韩安荆 韩安州	(257)
对北京市《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三辑叶龙章同志 所写《北京戏院考》一文的订正·····	辛 生	(259)
日本投降后苏体仁并未被捕·····	范光斗	(259)

瞻仰父亲李大钊的墓碑

李 欣 华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我专程到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参观了正在兴建中的父亲的陵园。

在陵园进口处是父亲的全身汉白玉雕像。在新建的墓碑上是邓小平同志的题词：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邓小平题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

烫金大字闪闪发光。

公墓管理处的同志介绍说：“这座陵园占地二千多平方米，正面的大厅是纪念馆，两侧是接待室。这座新墓碑横长四米，高二米。当年埋在地下的那块碑也挖出来了，已经安放在纪念馆的正中央。”

“那块碑是什么时候找到的？”我惊喜地问。

“今年三月十八日，你们全家来参加移灵安葬仪式时还没有找到。后来工人们又继续找，终于在四月三日于灵柩上首四十公

分处挖到了。”

为了瞻仰当年地下党为父亲镌刻的这块墓碑，我已经是第四次来万安公墓了。此次在为父母移灵时，由于很难找到当年安葬父亲灵柩的组织者，谁也说不准这块碑碣所埋的具体位置。感谢公墓管理处的同志们，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终于把墓碑找到了，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

这块有着历史意义的墓碑，抹去碑身上的泥土，字迹依然清晰可辨：

碑的正面上首刻有党徽图案，五角红星呈凹形，中间是凸形的黑色镰刀斧头。正文的大字是：

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

背面碑文是：

李大钊是马克思（恩）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爆发了！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竟无耻地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且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于肆（肆）月六日大举反共运动，勾结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拘捕李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在肆（肆）月二十八日被绞死于京师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难者二十人。这种伟大牺牲的精神，

正奠定了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给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最有力最好的榜样！现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也正是死难同志们的伟大牺牲的结果！

一九三三，四月念三，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于香山万安公墓。

看完这篇充满革命激情的碑文，我的心潮起伏，历历往事，涌上心头。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父亲英勇就义后，灵柩停放在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在当时的白色恐怖气氛下，父亲的灵柩不能及时安葬，竟然在浙寺里停了六年。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早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当时年仅六岁的我，和母亲、哥哥、姐姐一起参加了父亲的送葬仪式。当父亲的灵柩从浙寺里抬出来时，送葬的几百名群众都自动地唱起了悲壮的《国际歌》。送殡的队伍进入宣武门，人越聚越多，人们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花篮、花圈，每到繁华路口都要举行路祭。革命群众自动登上高桌讲演，宣传父亲生前光辉的革命业绩。记得走到西四牌楼时，送殡的群众已经非常多了，交通为之阻塞。大家一路上高呼：“李大钊同志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打倒刮(国)民党！”等口号。

革命群众为父亲举行公葬的行动，使国民党反动派丧胆，他们害怕父亲的革命影响继续扩大，急忙派出军警前来镇压。送殡的群众不惧强暴，徒手和军警展开搏斗。当时的花篮是装着土的，人们就用花篮投打军警。后来军警开枪射击，驱散了送葬的队伍，并逮捕了四十余人。尽管如此，也阻挡不住革命群众为父亲送葬的革命行动。出了西直门，仍有群众跟在我们一家人后

面。下午，我们全家把父亲的灵柩送到香山万安公墓。当时，为了掩护做地下工作的大哥葆华，给父亲打幡的任务改由我当家哥哥李振华（即李海涛）担任。我们护送父亲的灵柩快到万安公墓时，发现有一辆骡车跟在后面，时远时近，但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到达墓地后，才发现骡车上装的是地下党送来的一块墓碑。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这块碑是不能立在父亲的墓前的，只好伴随灵柩埋在地下。公开立在墓前的石碑的碑文是由当时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题写，上面有父亲的名字、生卒年月和子女的姓名。墓碑上大哥葆华的名字，为了掩蔽敌人的耳目，改写为荣华。安葬父亲后不到一个月，母亲也含恨离开了人间（母亲的碑文也是请刘半农先生题写的）。

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后，姐姐星华带着二哥光华和我回到河北乐亭老家。在老家度过一个暑期，姐姐又把我俩带回北平。在地下党组织和父亲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哥俩被送到香山慈幼院上学。每到星期六，别的孩子都被家长接走时，我们就更感到孤单，更加怀念亲人。当时姐姐在孔德学院上学，经济上比较困难，不能每个星期天都接我俩进城去玩。有时星期天没事儿，我和哥哥就常常偷偷地跑到万安公墓去瞻仰父母的墓。当年万安公墓一带是很荒凉的，我们由于想念父母心切，也就顾不上害怕了。好象在父母墓前多呆一会儿，就能得到父母的温暖和爱抚似的。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和大哥葆华一起去香山万安公墓为父母扫墓。那天中共中央林伯渠同志，北京市委彭真、叶剑英、刘仁等同志也都前往为父亲扫墓。林老代表党中央在父亲墓前讲话，他高度赞扬了父亲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光辉一生。

多年来，周恩来、陈毅、邓颖超等同志也曾先后到父亲墓前表示敬意。有一年，大姐星华在父亲墓前遇到了邓颖超同志。当时邓大姐在万安公墓附近养病，是特意来父亲墓前凭吊的。

每年清明节，前来为父亲扫墓的人络绎不绝。一九五七年的清明节，北京市的少先队员代表前来为父亲扫墓，在墓前遇到了大姐星华，至今还留下了大姐星华在墓碑前介绍父亲生前事迹的一张照片。一九八〇年，少年儿童在父亲墓前的四株松树旁，又新栽了一株松树苗，树干上悬挂的牌子写着：

一九八〇年清明节

海淀区少年儿童

这不仅是海淀区少年儿童，也代表着全国青少年，以至全国人民对父亲的敬仰和怀念之情，更进一步表明青少年决心继承先烈遗志，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贡献更大的力量。

十年动乱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目的，他们连牺牲多年的先烈也不放过。他们强加给父亲以种种罪名，诬蔑父亲是叛徒，并指使红卫兵到我们老家去调查。当这些红卫兵问到我们村的一位老贫农时，老贫农非常气愤地说：“说李大钊是叛徒，简直是瞎了眼！谁不知道他是被反动派绞死在绞刑架上的，临刑前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呢！”说完，他和村里人把这些受人指使的红卫兵轰出了村。

后来，在“四人帮”和那个阴险顾问康生的煽动下，一伙暴徒窜到万安公墓把父母的墓砸了，把墓碑推倒，连碑文里的灌铅也抠掉了。

历史的逆流总是不能长久的。“四人帮”的罪恶阴谋没能得逞，反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们来到父母墓地旧址，那里挖开的穴坑已经恢复原貌。墓碑前的一片空地上种植了花草，并且用精致的栅栏围了起来。在栏杆的东侧，新竖立了两块小石碑。父亲墓前的那块上面写着：

此处为李大钊烈士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公葬地
址原貌，灵柩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移葬李大钊烈士
陵园。

万安公墓管理处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六日吴未淳书

站在父母墓地旧址，我又象童年时代那样，默默地念着碑文上我们兄弟姐妹几人的名字。那一株株新种植的生机盎然的花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似乎在向我诉说什么。

沉思中，我忽然想到父亲生前曾说过：“我们是开辟道路的，是乘在‘时’的列车的机关车上，依它的主动力，向前迈进它的行程……”

在父亲和其他无数先烈用鲜血开辟的道路上，《庶民的胜利》已经成为震撼世界的现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正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我们兄妹五人，有的已经离开世间，有的退居二线或离休，只有我一人还工作在教育战线上。

我知道我应该肩负的历史责任，我知道父亲所说的“时”的列车应该赋予它怎样的意义；这是父亲的墓碑给予我的新的启示。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 （门头沟区政协供稿）

周恩来总理与冯玉祥将军的 亲密交往

葛 效 先

我父亲同冯玉祥将军在清光绪年间曾一起当兵，他俩是老朋友，所以我在一九二六年，就上了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后来，我又到西北军军官学校上学。一九三〇年毕业后，我被调到冯玉祥将军的总部工作，任随从副官。一九三八年，我被任为冯玉祥将军的警卫营营长。此后，我一直未离开他的左右。直到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冯玉祥先生出国考察，我才离开他的身边。

冯先生一生爱国爱民，追求进步。一九四一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为冯先生祝寿时，曾写道：“焕章先生六十岁，中华民国三十年。单就这三十年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在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们不敢为，说人们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这正是先生的成功处。”（引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

从上面的祝寿词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对冯先生是相当了解的，评价也是很高的。抗战时期，冯先生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住在重庆，与周恩来同志常常来往，过从甚密。当时我正在冯先生身旁负责警卫工作，对此颇有所知。以记忆所及，整理如下。

冯先生在重庆时，住在上清寺街一个名叫“康庄”的院落里，也就是冯先生的办公处。院子里有一幢三层小楼，警卫人员住在院子里边的平房里，参谋、秘书住在三楼，冯先生自己住在二楼。一楼有一大一小两间客厅。一般时候，来了客人，冯先生都是在一楼的大客厅里接待。如果关系非常亲近，又有机密、重大的事情，冯先生才把客人引到二楼的客厅去。那时，周恩来同志每周必来探望冯先生，多则一周两、三次，少则一次。我负责警卫工作，周恩来同志来去，经常是由我在门外迎送，开关汽车门，所以我对他的汽车的形状和号码非常熟悉，远远一望，便能认出来。

记得有一次，我看见周恩来同志的汽车来了，急忙迎出去，替他打开车门，他下了车，我又急着跑去通报冯先生。可是没注意到脚下的高台阶，绊了一下，差点没跌倒。周恩来同志在后边看见了，赶紧喊：“不要跑，别栽倒。我不是客人，我常来嘛！冯先生在家就好。”可见周恩来同志对我们是非常亲切和蔼的，也说明他和冯先生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冯先生平常会见客人，天气再热，也要穿上制服，扣上所有钮扣，装束得整整齐齐。可是每逢听到我通报周恩来同志来看望他，他便比较随便，象对待自家人那样，有时只穿一件衬衣，有时少系一两个钮扣，手里拿着两把大蒲扇，急急忙忙地从二楼

下到客厅来，自己一把，给周恩来同志一把，一边搦着一边说说笑笑，毫无拘束，也不讲客气话。我们在一旁端茶送水，有时也听听他们的议论。逢到中午，冯先生便留周恩来同志吃午饭，如果时间充裕，周恩来同志也不推辞。饭菜很简单，四菜一汤，没

说古论今，而且，有了重大的事情也常来找冯先生商量。记得在国共和谈时期的一天上午，周恩来同志匆匆忙忙地赶来了，神情稍有异样，好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和冯先生商量。在楼下见到冯先生后，两人交谈了几句，便上了二楼的小客厅。我想他们肯定有重大的事情。于是，我和冯先生的一位参谋名叫赵力钧的，一起到二楼的小客厅门口站了一会儿。门没有全关上，留了一条缝，我正好听见冯先生很气愤地大声说：“你们绝不能再同他们谈判，绝不能听这些混帐东西的鬼话。你们赶快突围，皖南事变吃的亏还小吗？”后来才知道，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出动二十多个师在湖北宣化店包围了李先念的部队，一方面又故意提出什么谈判。听到这里，我们便悄悄地退下来了。虽然我们这些警卫、参谋人员都是冯先生的学生、晚辈，都是在西北军中长大的，冯先生有事从不回避我们，可我们也不便老站在门外听。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周恩来同志匆匆地下楼去了。以后听说李先念的部队突围了。我们大家对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反共”的反动伎俩非常愤恨。

当时在冯先生身旁工作的人员中，我知道有两位是共产党员。一位是周茂藩同志，另一位就是上边提到的赵力钧同志。他们都是在西北军军官学校毕业后留在冯先生左右工作的人。抗战时期，二人都进过延安抗大。从延安回来后，赵力钧同志任冯先生的上校参谋，周茂藩同志被冯先生介绍到国民党军令部第二厅工作。

国民党军令部第二厅是属于军统的特务组织。周茂藩同志去了以后，为我党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八路军办事处。但是后来由于泄露机密，周茂藩同志引起敌人怀疑，终至

被捕。被捕后音信俱无。有一次，赵力钧同志悄悄地对我说，周恩来同志找过他，要他想方设法，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把周茂藩同志营救出来。但我们谁也不知道周茂藩同志的下落。说也巧得很，有一天，我出门由重庆南岸过江办事，在一个名叫海棠溪的汽车站上碰见了周茂藩同志，他被四个特务五花大绑押解着去监狱。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警卫营营长（这个警卫营实际是冯先生的部队，但是编制在军委会）。我就拿出证件叫特务看了看，指着周茂藩对他们说：“我和这个人过去同过事。我得问问他，他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把他抓起来？”特务们看了看我的证件，又看我穿着军官制服，披着呢大衣，带着手枪，于是没敢拦阻。我又说，绑着他还跑得了吗？他们只好退到一旁去。我小声问周：“你说了什么没有？”周回答：“我什么也没说。”我说：“好，就要你这句话。”临走时，我问特务要把周押到哪儿去，特务说押送到土桥场监狱。我心里有了底，赶快回到冯的住处，先找到赵力钧、王倬如同志，告诉他们上述情况，以便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并告知梁蔼然（党员）等同志，请他们快快设法营救，然后又向冯先生作了汇报。冯先生听到周茂藩没有说出什么时，赞赏地说：“好，这小子好样的，还真有骨气。”

经过党的多方面援救，主要是利用国民党的上层关系，最后才把周茂藩同志营救出来。大约在一九四三年，当时由梁蔼然、赵力钧和我一起到监狱里把他接了出来。周茂藩出狱后，身体很不好，先后在我家和赵力钧同志家休养了一段时期，然后直接到解放区去了。

冯先生知道周、赵二人是从延安抗大毕业回来的，对二人非常信任。有一次他和周恩来同志谈话中提到周、赵两位同志时